

The Holy Religion in Tibet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Tantra in Tibetan Buddhism

Jianhua Liu

Politics and Law Institut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Email: ydrwxy_jiaoshi@126.com

Received: Aug. 7th, 2017; accepted: Aug. 25th, 2017; published: Sep. 14th, 2017

Abstract

Buddhism had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its spreading process in Tibet. Thus Tibetan Buddhism that with some characteristics that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sect of Buddhism came into being. Considering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the formation of Tibe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Tibet after the Songzan Gambo's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e, we found tha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some other factors were combined into the basic tantric feature in Tibetan Buddhism.

Keywords

Tibet, Tibetan Buddhism, The Spreading of Buddhism

雪域神教

——藏传佛教重密传统形成考

刘建华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陕西 延安
Email: ydrwxy_jiaoshi@126.com

收稿日期: 2017年8月7日; 录用日期: 2017年8月25日; 发布日期: 2017年9月14日

摘要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终形成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独具雪域特色的藏传佛教。综合考量西藏自然环境对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影响, 松赞干布以降古代西藏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结构对文化形成的中时段影响以及渐顿之争等即时性历史事件之后, 发现藏传佛教重密特征形

成受西藏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颇深。

关键词

西藏, 藏传佛教, 佛教传播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历经 1300 多年的发展, 藏传佛教已经成为西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成为外界了解西藏的一扇窗口, 也因此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历史学界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包括: 佛教传入吐蕃研究, 藏传佛教形成研究, 藏传佛教分期研究, 藏传佛教通史研究, 藏传佛教教派史研究, 后弘期藏传佛教断代问题研究, 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 藏传佛教与佛教其他教派关系研究, 藏传佛教史籍整理、翻译研究。

关于藏传佛教的产生, 学者们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王尧在《西藏喇嘛教的形成》一文中谈到, 桑耶寺的建成、西藏本土僧伽组织的成立、佛经的翻译、佛苯斗争和佛教内部争斗的结束是西藏佛教形成的标志。王辅仁认为藏传佛教始于后弘期, 前弘期的只是传播到西藏的佛教, 而非藏传佛教[1]。李冀诚在《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上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提出了与王尧相类似的观点, 认为桑耶寺的建成、本土僧伽组织和教法传承的建立、译经事业的发达以及因吸收苯教因素而完成的佛教本土化是藏传佛教形成的标志[2]。佛教传入西藏之后经历了一段本土化历程, 逐渐形成了以密宗为主体、兼采显宗与苯教文化因子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 一、指在藏族地区形成, 以密宗为基础, 兼有大乘显宗和苯教文化特色, 经藏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 二、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 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 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 故又称“藏语系佛教”。本文考察佛教在西藏的形成, 仅涉及藏传佛教的第一层含义。

关于以藏密为核心的藏传佛教的形成, 学界有三种观点: 其一, 密法于 4 世纪就已流传于藏区, 藏密的最终形成是在 9 世纪; 其二, 藏密在藏区的形成时间为 7 至 11 世纪; 其三, 8 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是藏密形成的开端, 12 世纪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创立为藏密形成的标志。

关于藏密历史的研究, 比较重要的成果有: 谈延祚的著作《西藏密宗编年》(“用编年体记述了上至 3 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 下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时间跨度 1700 年的藏密兴衰史, 涉及印度密教源流, 藏密的形成、流派, 向外传播及重要人物等, 内容极为丰富。”); 黄心川的文章《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在论及藏地密教时, 提出了‘印度密教与西藏密教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的, 在某一个时期还是同步的’观点, 强调西藏密教为印度佛教的延伸部分。”); 李冀诚的著作《西藏佛教密宗》(“以藏密为全书重点和核心的通俗性著作, 对西藏佛教密宗的发展, 勾勒了一个清晰的轮廓。”)[3]。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学者们已就西藏佛教的形成和以密宗为核心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做了许多研究。但是佛教进入西藏时是显密并进的, 西藏文化为何选择密宗为藏传佛教的构建核心而不选择来自内地的显宗呢? 对此问题, 学者们却语焉不详。本文以藏传佛教发展史上著名的“顿渐之争”事件为出发点, 通过对该事件、隐含于该事件发生时西藏社会状况、以及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孕育的文化心理的短、中、长三历史时段的综合考察入手, 讨论藏传佛教重密特征形成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

以期对此问题的解答有所助益。

2. 西藏本土宗教与佛教的早期传入

在探讨藏传佛教形成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前佛教时期的藏族社会文化有一简略认知。佛教传入西藏之前，流行于西藏地区的宗教是具有巫教性质的苯教。“苯”，意为“颂咒”、“祈祷”和“咏赞”。苯教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雷电冰雹、山石草兽等各种自然物、自然现象以及众多神灵和鬼魂。苯教将世界视为许多相联系的“方格”，每一个方格象征一个部落，每一方格又分为三层不同的空间，分别代表天上、地上、地下，依次为部落的神、人、魔鬼所居。方格的并立，象征着原始部落之间独立平等、互不相统的关系。苯教崇神畏魔，为此产生了通“鬼神之路”的巫人，这种人被称为“苯波”。苯波通常以鼓为法器，给人们驱鬼治病，卜算吉凶，主持葬仪，受到部落成员的普遍敬信。苯教分为两种：以念颂各种咒文为主要仪式的原始苯教和辛绕弥沃创立的有完整教义和教规的雍仲苯教。亦有学者认为苯教发展应为三种：以祭祀、禳祓、遗送、役使鬼神的巫术为主的笃尔苯(笃尔在藏文中含有自生之义)；在巫术活动基础上有完整教义理论的恰尔苯(恰尔在藏文中意为传来)；大量吸收佛教教义、教仪而成的居尔苯(居尔在藏文中有改编之义)。^[4]其中，雍仲苯教曾经作为整个吐蕃地区的唯一宗教构建了当地人民的信仰基础，但是后来信奉苯教的大臣由于政治势力过大而遭到了王室忌惮，因此，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传入吐蕃后，吐蕃历代赞普开始扶植印度佛教，苯教则被斥为“黑教”(邪教的意思)，苯教徒们被迫改宗印度佛教，不愿意改宗的苯教僧人被迫逃亡到阿里、康区等边远地区，苯教从此逐渐衰落并最终被佛教取代。

当然，以佛教取代凝聚藏族文化传统的苯教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多次波折。松赞干布时期，西藏虽因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之故已经有了佛寺(小昭寺和大昭寺)，但因松赞干布权力稳固，加之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本人并不信仰佛教。^[5]松赞干布之后，佛教逐渐成为赞普在思想领域削弱贵族势力的一种工具。历代赞普在王室内部逐渐确立了佛教信仰。740年西藏发生了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天灾。这场疫病的流行成为苯教贵族与赞普赤松德赞争夺权力并驱逐佛教的借口，最终导致第一次禁佛运动的发生。第一次禁佛运动在赤松德赞成年后即告失败。为了削弱贵族势力、加强王权，赤松德赞成年后开始弘扬佛教。史书记载，为弘扬佛教赤松德赞活埋崇苯代表马尚仲巴，流放达扎路恭。佛教信仰在赤祖德赞时期达到第一个顶峰。具体表现为：赞普用头发制成供佛教徒使用的坐具；盛邀名师翻译佛教典籍；众建寺庙，确立七户养僧制度，并在法律上保护僧人利益；确立僧阶，委任僧人处理国家事务。

赤祖德赞之后朗达磨为争取苯教贵族支持再次灭佛。此次灭佛对西藏佛教打击十分沉重，以至于此后百余年在西藏佛教史上被称为“灭法时期”。学界普遍将朗达磨灭佛之前的佛教发展成为前弘期，即藏传佛教的早期发展。

佛教在西藏早期传播的特点是印度佛教后期密宗重修持的特征与内地佛教显宗重哲理的特征并行不悖。这一结论不仅被佛教界所广泛认同而且亦可从史书记载中获得。《贤者喜宴》记载：“桑耶寺落成后，七人出家。以超岩寺说一切有部比丘十二人为轨范师，于羊年(779)二月初八日，在扎马宫以菩提萨锤(即寂护，汉译静命)为堪布，举行仪式”。《册府元龟·外臣》记载：“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781年)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岁一更之”。

朗达磨之后佛教进入后弘期。后弘期佛教复兴过程虽然缓慢但步伐坚定，逐渐成为西藏民族信仰的主流。

3. 藏传佛教的形成

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历史可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他认为，历史学

家不仅要对其短时段的政治、军事等事件做详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长时段的发展，要从对中时段(数十年)的周期波动的探讨中，从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长时段中，进一步找出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以及延续于其中的基本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

布罗代尔的思想显然可以给我们研究藏传佛教的形成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西藏佛教显密并取的和谐局面在桑耶寺落成后不久就被佛教内部的顿渐之争所打破。以来自敦煌、年轻时在长安修法、师宗北禅宗神会大师的摩诃衍那为一方，来自印度、曾修法那烂陀寺、学从寂护的莲花戒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争论。摩诃衍认为，成佛不需长期依靠持守戒律兴修佛法而成，而是靠突然得到内在的“顿悟”；人不作恶念，也不作善念，应排除各种思考，保持一种完全宁静的状态，只有无想、无思维、无尘障，才能得到“大禅定”，进入突然的大彻大悟的状态，从而成佛。莲花戒则认为，“立地成佛”的说法是荒唐的，犹如爬山，只能一步步地爬，不可能一下子到达顶峰；人不可能放弃他的意识活动，因为当一个人对他自己说我将不想一切法、不思虑时，这已经是一种行动。赤松德赞表示赞同渐门的观点。在王权的支持下，争执的最后结果是，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佛学最终取得胜利，摩诃衍那等内地僧人被遣回，教法被禁止，门徒有的愤而自杀，有的宣布改宗。

从此以后，西藏佛教走上了重密轻显的发展道路。显然，顿渐之争只是西藏佛教走上重密轻显发展道路的直接原因。至于西藏佛教重密轻显传统的形成，我们还应从当时吐蕃的政治、思想、文化状况以及宗门、现实利益等角度去考量。

从政治角度来看，吐蕃和唐王朝之间的连年战争，双方互有胜负，两种文明正处于冲突之中。摩诃衍那作为战俘在拉萨弘扬禅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数万人的拉萨，就有弟子 5000 多人。^[6]摩诃衍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显然会遭到赤松德赞的猜忌。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赤松德赞必然不会允许敌方的俘虏拥有如此大的势力，不会允许以唐文化为背景的大乘显宗在其统治区域内的佛教宗派斗争中获胜。

就思想角度而言，摩诃衍那在辩论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其思想本身不太符合当时吐蕃社会和统治阶层的需求。摩诃衍那弘扬的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重视研究中观般若学并吸收了部分道家思想，彻底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宗派。摩诃衍那时期的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意在“不立名相”，追求的是“一路所问，千圣不传”的第一义，这种义是离一切语言文字相、心缘相、分别相的。语言文字只能作为所显义理的媒介，真正的义理是不可借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但是与唐文化相比，吐蕃文化较为落后，加之佛教传入吐蕃不久，吐蕃对佛法的认识还不深，如果只强调佛学义理的智慧，不谈佛教修行的方便，便会阻碍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无法满足统治者对佛教作为思想控制工具的要求。这种认识在辩论展开之时就已经存在。成书于 8 到 11 世纪间的西藏史书《巴协》就谈到：“和尚之教顿悟者，于十法行有害，使其不能实行，使心沉溺，使余与别人之修习受阻停顿，心沉溺而教则衰，彼等断不能修其教矣^[7]。”

从文化角度考量，如前文所述，佛教传入前，吐蕃的本土宗教为苯教。苯教具有巫教性质，崇神畏魔，并有能通“鬼神之路”的“苯波”利用法器驱鬼治病、卜算吉凶、主持葬仪等。佛教发展到印度晚期为了自身生存，逐渐吸收印度民间信仰，对咒术、密法等加以摄取，认为只要口念真言，内心统一，建立方圆之土坛，供养诸尊，严修仪礼，即产生不可思议之功德，并将吠陀以来诸神，用组织进自己的体系内。七世纪后半期，印度晚期佛教(密宗)已经有经有教，有轨有仪，并融入了中印度流行的性力派思想。由此可见，苯教和印度晚期佛教(密宗)有共同的特征：二者都强调对咒术的使用，都将人与信仰对象的神异沟通看作是获得解脱的唯一途径。因此，与强调心灵内省、重视哲理思辨的内地禅宗相比，吐蕃人更易接受印度晚期佛教。此外，西藏文字创建于松赞干布时期，其参照母本是印度文字，西藏文化对印度文化自然更具有亲近感。

从宗门的角度来看，印度晚期佛教(密宗)与禅宗均由早期印度佛教发展而来，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赤松德赞有理由认为来自印度的佛教相较而言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因此更倾向、尊重印度的密教也在情理之中。“西藏人认为印度是出圣人的国家，对印度避免进行批评，对它表示绝对的尊敬。在这一点上自古迄今丝毫未变[8]。”

西藏对印度文化的崇敬亦可从两个神话传说中窥见一斑：

松赞干布前五代托托日年赞(陀土度)时，有五位印度僧人被聘为王师。托托日年赞 60 岁时，空中降下四宝，可是当时的民众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询问那五个印度僧人，才知道四宝是：合掌的莲花手、小舍利塔、刻有“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的宝珠、《庄严宝王经》

一时佛陀为众弟子所环绕，座于竹林精舍苑中，眉间忽发五色妙光宛如虹霓，其光屈折射向北方雪国(西藏)，释尊莞尔而现无限欢喜，目视彩光的方向。一菩萨请释尊说明此奇瑞的原因，释尊乃授以《梵莲华经》，经文言曰：“此恶魔恶神所居住未开化的雪国，三界诸佛从未施以教化，但将来我教将传入此国，恰入太阳光照全国而教化之。”活佛乌泽克齐乃自愿前往教化此未开化的雪国，此活佛前身原为菩萨，在请佛之前曾立誓愿曰：“我将往三界诸佛未往的雪国任教化难以济度的人民，此雪国将为我教化之地，我能将恶神恶魔化为慈父慈母，我能为其师，我能成为照耀彼等黑暗的灯光。三界诸佛的圣教将照耀此未开化的雪国，对三宝的信心将感无量乐福，一切众生皆大欢喜”。菩萨作此誓愿时，由菩萨之心发出“萨达利加”华般的光明，普照全世界。嗣后其光明上升西方极乐世界而没入光明无限的佛心，不久再由无量佛心重现，以教化雪国化身为佛的宏愿，没入莲花之海[9]。

就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考量，虽然在前弘期进入吐蕃弘扬佛教的既有印度僧人，也有内地僧人，甚至还有为躲避伊斯兰战乱的中亚、西域僧人，但从总体来看印度来的名僧最多，仅在赤松德赞时期就有寂护、莲花生、莲花戒、无垢友、觉密、法称、胜友、施戒、净狮子等人入藏弘教。桑耶寺建成后首次收徒的亦是印度僧团。由此可见，相较内地僧人与中亚、西域僧人而言，印度僧人已经占据了在吐蕃弘教的优势地位。驱逐印度僧人较驱逐内地僧人更易引起社会动荡，为了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的稳定，赞普首先会考虑牺牲内地僧人的利益，而非印度僧人的利益。因此，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赞普也会在重密轻显问题上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

对于西藏佛教重密轻显传统的形成，我们还可以从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孕育的文化心理去做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体，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高原。西藏地形复杂多样，主要分为四个地带：一、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岗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二、藏南谷地，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的地区；三、藏东高山峡谷，即藏东南横断山脉、三江流域地区；四、喜马拉雅山地区。西藏的地质和气候条件异常恶劣：几乎全部属于冻土地带，大部分是永冻土；昼夜温差极大，很多地区常年处在一日之内温度正负交替变化的状态下，使得地表土壤反复融化又反复冻结。在这种状态下，山体和岩石表面不断形成剥裂，满山满沟堆积着碎石；西藏的大部分降水，基本上是雪、霰、雹等固态水。

当藏人蜷缩在帐篷里倾听外面的风暴雨雷之声，或者拳头大的冰雹砸在他们头顶，或者目睹千百只牛羊死于雪灾时，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进每个人的灵魂。不难想象，西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异常艰难的生存条件以及因空旷无助而产生的寂寞对藏人世世代代经历的灵与肉的磨难有多么沉重！这必然造成了西藏人对外部世界的恐惧。我们知道恐惧是早期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宗教起源的解释之一就是，恐惧导致敬畏，再由敬畏发展到图腾膜拜。恐惧，同时又必须化解恐惧，这组矛盾形成了

一个难以解决的命题。这一命题的解决仅仅在于用明确和有规则的对解决恐惧(通过咒术对神魔的压制)的想象去超越现实生活所遇到的一切恐惧。因此,西藏佛教崇拜的偶像往往是以凶恶、恐怖的面目出现于世间主持公正的神灵。例如,观音菩萨在内地佛教中的形象是慈祥且美貌的女性,但在西藏佛教中,却表现为被称作“贡保”的凶相——一个黑色巨人,手拿头颅,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做的项链,脚踏一具死尸。

这种超越现实恐惧的、明确且有规则的神力是如何获得的呢?在藏人意识中只能通过人与神的沟通来获得。但是这种沟通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具有虔诚信仰且坚持修行的专职神职人员才能做到!普通人克服恐惧、获得安全感的途径就是追随、听从神职人员的安排。由此,西藏文化中产生了两种认识:对神职人员苦修的赞赏和对进行此类苦修的神职人员的崇拜。藏文化认为,只要严格服从和依附明确和有规则的“克服”恐惧的方法,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现实生活所遇到的恐惧在心理上造成的重负。这是西藏佛教转向重咒术与修行的密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密教强调严格的修行和对咒符的应用。

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记载了三个苦修者以幽闭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思索宗教圣意(两个修行者是在林格的石洞中,另一个是在龙·间登·恭巴庙的附近的石洞中)的故事。

一个喇嘛整整三年就幽闭在这个漆黑的洞穴里,他在这整个时间从未同外界接触过!他于三年前到林格来,既无名字,也无人认识他,那时石洞正空着,他便发了一个最艰苦,最殷切,最可怕的“和尚愿”:让他那残余的生命幽闭在石洞里。不久之前才死了一个别的隐士,在他在这洞里过了十二年之久。这人之前还有一个和尚在这里黑暗中活了四十年之久。龙·间登·恭巴庙的和尚,庙的附近有一个相似的石洞,曾经给我们讲及一个隐士,他很年轻就走进黑暗中,和世界和阳光隔绝地活了六十九年,当他感觉到他的末日将至时,他热望着再看看太阳,已是忍受不住,不得不示意给别的和尚,让他自由了。但这老头却完全瞎了眼睛,他刚走进阳光中,就倒地死去。六十九年前把他封闭起来的喇嘛当时没有一个还在世的。

住在这个林加·恭巴的洞穴并负有“圣僧”(Lama Rinpotsche)尊号的隐士大概有四十岁光景。他必是沉在静观中,并梦想着涅槃。他所自愿的“忏悔”将他从轮回的苦痛中解放出来,他死后将走到永远的安息——虚无中去。[10]

修行者的这种苦修不正是在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孕育的文化心理指导下以生命为祭品对重密轻显的藏传佛教的献祭吗!

4. 结论

现代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整体社会是由许多子系统整合而成的,每个子系统的功能在于通过个体更加专门化的发展促进整体社会的全面发展,连接子系统与整体社会的纽带就是社会的整合机制。据此分析,古代社会的整合机制主要有四项:语言、亲属关系、技术和宗教。

语言与文字的出现,通过亲属关系形成的部族关系,以及通过技术实现的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为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做了准备。宗教的意义在于,当准备进入文明时代,人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之后,人开始将现有秩序分裂。秩序不再仅仅被认为是现实的、属人的,而且还被认为是超现实的、属神的。分裂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人类生活的真实社会秩序与神主导下的虚幻理想社会秩序的相互依赖但又彼此冲突情况的出现。后者在借用前者的成果,将前者终极化、理想化,从而实现对前者的超越,确立自我优越性。优越性确立之后后者就可以按照自身思维要求去“和谐”前者,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功能。

藏语以及松赞干布时代藏文字的出现,通过亲属关系形成的“父王六臣,母后三臣”部族关系,以及通过技术实现的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为西藏进入文明时代做了准备。苯教的出现实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初步整合。佛教传入西藏后统治者发现,相较苯教而言,佛教对藏族社会的整合能力更强,更有利于藏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情况下宗教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镶嵌在权力与秩序之中

变味了的政治工具。因此，我们只有在综合考量西藏自然环境对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影响，松赞干布以降古代西藏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结构对文化形成的中时段影响以及渐顿之争这种即时性历史事件之后，才能对藏传佛教为何会走上重密轻显的发展道路做出正确解答。脱离这一点奢谈以上问题只能是镜中观花、水中望月。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王辅仁. 关于西藏佛教(喇嘛教)及其教派的形成时间问题——兼与王尧同志商榷[J]. 世界宗教研究, 1981(3): 132-137.
- [2] 李冀诚. 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上的一些浅见[J]. 世界宗教研究, 1986(1):43-55.
- [3] 任继愈.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卷)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88-89.
- [4] 才让太. 苯教历史三段论之由来及剖析[J]. 中国藏学, 2008(4): 61-68.
- [5] 弘学. 藏传佛教[M]. 四川: 四川出版集团与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27.
- [6] 王尧. 吐蕃佛教述略[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0(4): 2-15.
- [7] 周拉. 从“顿渐之争”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及发展趋向[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7, 33(3): 14-19.
- [8] 多田等观. 入藏纪行[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100.
- [9] 弘学. 藏传佛教[M]. 四川: 四川出版集团与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22-23.
- [10] 斯文·赫定. 亚洲腹地旅行记[M]. 李述礼, 译. 上海: 开明书店, 1948: 493-495.

期刊投稿者将享受如下服务:

1. 投稿前咨询服务 (QQ、微信、邮箱皆可)
2. 为您匹配最合适的期刊
3. 24 小时以内解答您的所有疑问
4. 友好的在线投稿界面
5. 专业的同行评审
6. 知网检索
7. 全网络覆盖式推广您的研究

投稿请点击: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 ojhs@hanspub.org